

零合的社會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余羅 著 林富松校訂 陳時奮譯

**THE
ZERO-
SUM
SOCIETY**

零合的社會

著 者：余羅（Lester C. Thurow）
譯 者：陳時奮
發行人：蘇拾瑩
出版者：長河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1535號
台北市光復南路473巷11弄18號
電 話：(02)7036679 702-6235
郵 撥：165123號
印刷者：振利印刷廠
台北市萬大路534巷13號
初 版：中華民國 71 年 6 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 32.00 元
(本書如有缺，請寄回調換)

511
D202 - 11
971

零 合 的 社 會

The zero-sum society

麻省理工學院 教授 余羅 著
林富松校訂 陳時奮譯

代序

這本「零合的社會」(The Zero-Sum Society)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及企管教授余羅(Lester C. Thurow)的巨著(指的是內容，而非篇幅)。該書出版之後，不僅登上美國非小說(Nonfiction)暢銷榜，更在美國的政經界激起一股迴響，經濟學家蓋爾不列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稱此書為「絕佳的好書，對時下問題的癥結有極透徹的洞悉。」(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這本書所以普受矚目，自然與雷根政府的經濟政策有關。另有一本書更出盡鋒頭，甚至被雷根政府奉為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的圭臬，那就是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的「財富與貧窮」(Wealth and Poverty)，由於原書甚厚，國內尚無中譯本)。在觀念上，吉爾德與雷根總統一樣，對美國的經濟抱持著樂觀的態度，儘

管他不否認經濟中亦充斥著各種弊端，然而他却深信，技術進步與企業精神終能引領美國邁向康莊的坦途；余羅却認為，美國的隱憂實已深植於社會中，除非經過痛苦的結構性改變，實不足以治愈社會的病態。余羅與吉爾德間曾有過一場精采的辯論，依「新聞週刊」記者安德生（Harry Anderson）的報導，似乎余羅教授從頭至尾均處於上風。

「零合的社會」係借自賽局理論（Game Theory）中常用的「零合賽局」（Zero-Sum Game）。在這種賽局中，有贏必有輸，勝負必相抵。因此暗喻美國的社會，係一勝負相抵的社會，倘若有人獲取經濟利得，也必有其他的人蒙受相當的損失。本書共分八章（原書二一四頁），余羅教授由一九七三年阿拉伯國家石油禁運談起，提出一些美國社會中始終未能解決的問題，如物價膨脹、遲滯的經濟成長、環境保護的問題、法令規約及所得直接再分配等問題，最後提出一九八〇年代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見解獨到，分析鞭辟入裏，值得細閱深思。總括而言，他所關注的，乃是經濟中的公共政策，他認為目前美國所採取的政策，將無法維持實質所得每年大幅度的成長。他特別提到，經濟中技術的進步及政府的干預雖對大多數人有利，却也對少數人造成損害。所以他認為「短期而言，價格管制可緩和實質所得的降低，然而犧牲的代價却是阻止了其他某些人所得的提高。」；「緩和短期短缺痛苦現象的方法，將造成長期短缺的惡化，且因而增加長期的痛苦。」

余羅教授對物價膨脹的看法亦不同於唯貨幣論的傅利得曼教授，余羅似乎趨向成本推動

的理論。他特別強調，在成長緩慢的社會中，欲治療物價膨脹，往往有副作用存在，也就是會使某些人的所得減少，另外一些人的所得增加，造成所得重分配的現象。他並且指出，透過所得的直接重分配，能降低貧富間之差距，使社會更趨美好。然而他建議採用的方法，却非直接的租稅移轉政策，而是透過大量的聯邦「保證工作方案」，提供各種不同薪資階層人士之就業。這方法將創造一種「經濟的社會化部門」，且對民營部門形成壓力，促使民營部門依所需的經濟公平標準，調整部門內的工資水準。

這本書的政策含義實大於其經濟含義。所揭櫫的觀點雖屬悲觀，立論却頗正確（尤其引證之資料更是正確有力），未來就算坎坷難行，只要認清問題所在，提出有效對策，困難必可迎刃而解，這才是余羅教授在本書中真正欲發揚的精神。雷根政府對美國經濟的未來抱著樂觀的態度固然可喜，但有不少問題却非僅憑信心便可解決的。認識自己的本質，勇敢面對未來實乃本書吸引人的地方，而在闡釋問題及分析問題上均屬上乘之作，今由陳時奮君逐譯成中文，以饗讀者，筆者有幸先過目原稿，乃代為之序。

林富松

謹識於國立交通大學

管科系

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八日

目錄

代序

第一章 停滯的經濟

九

第二章 能源短缺

三五

第三章 通貨膨脹

五五

第四章 低經濟成長

九九

第五章 環境保護問題

一三三

第六章 擴張的法令與規章

一五五

第七章	直接再分配的爭論	一九五
第八章	解決一九八〇年代的經濟問題	二四三

第一章 停滯的經濟

數十年來，美國人堅信他們的經濟無懈可擊，一九七三、七四年阿拉伯石油禁運動搖了他們這個信念。幾個阿拉伯酋長，逼得他們在加油站前大排長龍，使他們不得不實質的降低生活水準。突然的經濟衝擊，像早期的心臟病般令人不安，這提醒我們，未來的經濟可能是不樂觀的。

一九七九年，主要石油輸出國家幾個月的石油減產，再度引起騷動，不禁令人感到疑問，那早期的心臟病是否為壞兆頭，無法解決的問題到處都存在，通貨膨脹、失業、低成長、環境污染、不妥協的團體要脅、複雜無效的規章，是這些問題無法解決？或是我們的領導者無能？美國人的工作準繩亂了嗎？我們在新製程、新產品的發展停頓了嗎？我們應該作更多的投資更少的消費嗎？爲了競爭，我們應該廢除社會福利、健康、平安及環境的保護制度嗎？

？爲何其他的國家做得比我們好？

美國的經濟曾促成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現在已經降低了，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摒除中東富有的酋長國家不談，一九七八年，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居世界第五位，已被瑞士、丹麥、西德，和瑞典超越。瑞士第一，高出我們45%，除此之外，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日本，僅落後我們7%，在我們歷史中，未曾成長達日本成長速度的一半。

一九七〇年，我們首度注意到經濟的衰退。早在一九五〇年，我們就被科威特超過（在達到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準半個世紀後），由於科威特是繼承遺產（石油蘊藏）而不是自己經營致富的，所以被我們忽視了。但我們忘記了，我們輝煌的成就也是基於大量的遺產所致，大量的煤礦，能源及自然資源，沒有人繼承得比我們更多。我們不是一個窮小子，靠自己努力工作而致富，而是擁有大量遺產的有錢小孩，那些遺產現在也許被我們浪費光了，可能沒有那些遺產，我們就無法倖存。

當然，經常有人辯說事實並不如想像中這麼糟，因爲我們許多產品並未投入國際市場，同時產品的國內價格比較便宜，我們的國民生產毛額相對的就被低估了。一群美國經濟學家辯稱，一九七五年，我們在工業化國家中，仍享有最高的實質生活水準，雖然國民生產毛額已被兩、三個國家超越，但我們在生活成本的降低方面更具成效。

今天這種說法是否仍然正確，就須看貿易條件的變化而定。人們必須放棄一定數量的消

費以供出口，然後換回等值的進口。例如瑞士，一九七八年的石油成本比一九七五年還低，石油價格雖然上漲，但瑞士法郎的幣值升得更多。因此，國內放棄更少的消費來出口，就可購買等量的石油。像瑞士進口超過國民生產毛額三分之一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對其生活水準勢必有頗大的影響。

儘管計算國民生產毛額非常容易，然而不同國家之間，精確的比較生活水準則非常的困難。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會趨向購買價格相對便宜的財貨。消費者的偏好、環境、傳統和習慣的不同，其所購買的商品和勞務必然不同。甲國屬於必須品的財貨，在乙國可能是奢侈品；健康醫療在甲國由政府供給，在乙國可能要個人負擔。該怎麼決定這巨大消費的價值？比如以預期壽命來看，我們在健康醫療上花費最多，但成果卻較小（美國男性壽命在全世界排行第十六位）。

無論現在我們如何精確的排列比較，其他國家正快速的追趕上來，如果現在尚未超越我們，很快的，他們將會做到。從各個觀點來剖視，這超越的過程應是我們所希望的。多數富人發現，與其他富人為鄰，生活會更舒適，情緒較不會緊張，生命更值得享受。然而，令我們覺得不快的是，鄰人有繼續加富的希望，而我們相對的衰退了。

當其他的國家趕上我們後，他們的成長將會減緩。目前，我們一直以此自我安慰，或者我們這麼告訴自己——採用他人已發展成功的科技比自行發展更容易。但是其他國家到達我

們的生產效率水準時，他們個別的產業已具有更大的生產力。「趕上」之後就會減緩的說法將是毫無說服力。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之間，美國的工業生產力上升1%，西德4%，日本5%，這些國家推出新產品或改良既有產品製程的速度比我們更快。多數的美國工廠已減少新消費財的銷售，例如日本獨家製造的錄放影機。許多工業，例如鋼鐵業，我們現在所具的任務是採用他人發展的科技，我們躲進反對日本鋼鐵不公平競爭的保護中，而不廢棄老舊的平爐，改變成高氧爐，並使用日本鑄造技術。我們為鋼鐵付出的代價高於應付的代價，結果是降低我們的實質所得，我們的經濟，因為鋼鐵業的缺少競爭力而失去衝勁，迫使美國市場採行保護政策。

這種相對的經濟衰退有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影響。在經濟上的影響方面，由偶而來往的觀光客（外國人到美國來或美國人到外國去）更明顯的表示我們生活水準落後了。美國人面對著生活水準相對的降低會如何反應，沒有人知道，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經驗。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沒有人樂於看到他人享用得起而我們却負擔不起。

祇要生活水準的差距越來越大，對政府和經濟的運行也將越不滿。所得差距越大，要求改革也越激烈。今天落後國家處於騷亂中，但較之從前更貧窮的歲月，現在並不算貧窮，他們與今天富有的國家相較之下顯得貧窮而已。如果我們也相對得更貧窮，我們將更易於感到

不悅。

衰退的經濟，在政治上表示我們若要對世界維持一定水準的影響力，我們必須在個人消費上作更大的犧牲，這是可能的狀況。雖然蘇聯的國民生產毛額比我們低很多，但他們已成為我們軍事和地緣政治的對手，因為他們將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大部份用於國防。但在民主國家，需要減少國民消費時將會引起抵抗，在極權國家卻不會。美國人可能漸漸決定，他們無法提供更多的國家戰略上的防禦。他們可能決定，為促使和解更順利而提供經濟補償已不可能，例如以埃之間的和談。一些國際經濟的負擔將轉移給比我們更富有的盟邦。不可避免的，這意味著他們將作更多國際決策。在很多狀況下，西德和日本所做的決策也可能與我們不同。（以埃對抗？）

極端保守的解決方案是「企業自由化」，減少社會支出，重建稅制，以鼓勵儲蓄和投資（將稅捐由富有的儲蓄者移轉到貧窮的消費者），刪除對企業不利的規章法律，特別是一九七八年降低的資本所得稅要降得更多，股息雙重課稅要廢除，貧戶和老年人的移轉性支出應該凍結，環境保護主義應被視為經濟的威脅，應該倒退，雷佛曲線（*Laffer curves*）將會像雜草發芽般顯示為了恢復個人的創造、進取心，稅捐應該刪減，祇有藉著努力工作的美德和企業自由化才可以挽救我們的經濟。

細思這個方案，我們將知道，我們的競爭者，沒有任何一個是經由這條途徑成功的。美

國政府課稅約佔國民生產毛額的30%，但西德政府課稅超過50%，十五個其他國家的政府，國民生產毛額的一大部份充作稅捐。

別的國家不僅大量的徵收賦稅，而且普遍的干預企業。西德的工會領袖依法爲公司董事會的一員，瑞典以福利國家的成就而著名，日本則以某種程度的集中投資計劃和政府控制而聞名，這會令任何一個資本家爲之哭泣。其他國家的政府擁有或控制該國的主要公司，例如福斯汽車公司（Volkswagen）或雷諾汽車公司（Renault）。我們的規章法律不僅不是最多，相反的，是最少規章法律的。當多數美國公司發現經營不利時，沒有任何地方比我們解僱一位工人更容易。這種作法好壞尚不得而知，但是全世界各處沒有任何地方比這裡更易解僱一位工人。

我們的競爭者從未藉著增加所得差距的辦法來鼓舞人們努力工作和儲蓄。事實上，他們剛好相反，如果以所得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人口比較，西德差距比我們低36%，日本更比我們低50%。所得差距如果會鼓舞人們的進取，我們應該有更充足的進取心，所有工業化國家，祇有法國的貧富差距比我們大。

此外，我們的歷史顯示自羅斯福「新政」起，政府干預之後的經濟成長比政府干預前更好。我們經濟最好的十年在一九四〇年代（GNP上升36%），當時，我們的經濟就像戰時的管制經濟。一九六〇年代（GNP實質成長30%），我們有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在政府干預

及社會福利制度實施後，與政府干預及社會福利實施以前相較，我們經濟成長超過兩倍以上。

如果我們不改變我們的方式和轉變政府日趨龐大的趨勢，我們將會有什麼後果？英國經常被當作一個可怕的例子，但是無論英國的經濟如何糟，這和政府規模的大小沒什麼關係。在十九世紀英國經濟成長就比那些先進工業化國家落後，而且一直是落後著，一九四五年的工黨政府並未延緩經濟成長，相反的，一九四五五年後，英國經濟成長反而比以前更好。無疑的，英國的經濟處於一很壞的情況下，但西德證明了經濟問題和政府規模並不是簡單的函數關係。

由我們或外國的經驗證實，經濟成就和政府干預及社會福利支出並不相衝突。事實上，投資計劃、工人分紅、社會支出等的減少才是造成經濟惡化的原因。照我們或外國的經驗，社會改革如果方向正確則必然具有生產性與公正性。當然，如果方向錯誤，除了引起災難外，也無公正性可言。企業自由化如果實施正確，可能也會有某些優點，一些不需要的規章法律確實壓抑著我們的經濟，重要的並不在於規章法律的有或無，而在於尋找正確的規章與法律。

美國的問題並不是希望重返經濟成長的黃金時代（不會再有這種黃金時代），而是承認我們的經濟結構在整個歷史中，不曾像日本、西德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那般運行。我們現在必